

非联盟国家深度合作可行性探究

——兼议“十四五”规划与中俄战略合作前景*

欧阳向英

后疫情时期，非联盟国家间如何开展合作，是一项重要议题。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又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新型国家关系的代表，能否深度合作关系两国发展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大局。本文以中俄在“十四五”期间到2035年的安全环境、收益路径和身份认同为例，说明：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不等边变化，拉近了中俄在安全领域的距离；扩展利益对中俄十分重要，但双方在合作对接上还有改善空间；中俄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立场一致，为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非联盟国家深入合作有很多前提，但最主要的还是相互尊重。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联盟国家必将冲破重重阻碍，将全方位务实合作推向前进，从而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非联盟国家 国际合作 “十四五” 中俄关系 俄罗斯经济

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大流行后，一些国家和地区孤立主义盛行，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断裂的风险随之增加。然而，全球化时代，孤立主义是对别国的拒斥，更是对本国的封锁，于人于己不利。作为偶然因素，此次疫情终将过去；作为必然因素，互助互通终将上升。国际合作是大势所趋，不会因短暂的逆流而改变方向。中国是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的捍卫者，同时是不结盟运动的支持者。后疫情时期，中国如何与非联盟国家展开合作，是一项重要议题。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又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新型国

欧阳向英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Email:oyxymail@126.com。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0ACJ0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议，文责自负。

家关系的代表，在即将开启的“十四五”到2035年这一关键期能否进行深度合作，事关两国发展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大局。

问题的提出

联盟作为国家间具有战略合作意义的特殊关系，一直受到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界的重视。用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的话说，联盟是一种正式的国家间联合行为，目的是在安全、国际政治和经济事务中拥有坚定的支持者。^[1]帕特里夏·韦茨曼（Patricia A. Weitsman）指出，联盟的形成与共同利益之间不是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在特定的情况下，敌对的国家之间也可能有动机来形成联盟”^[2]。也就是说，对手或潜在对手也可以结成联盟。这就极大地改变了对联盟关系的认知。从结构现实主义开始，安全就作为结盟最重要的因素而存在，与之对立的是威胁。然而不结盟运动恰恰是在美苏之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群体中兴起的，当它们受到“选边站队”的威胁时集体选择了中立和观望。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除了威胁，扩展利益也是联盟的重要考量。如果各国在改变秩序和获得利益方面有共同利益，就可能结盟。然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在改变秩序和形成产业链条方面虽具有共同利益，可苏联却解体了，此后想要重新凝聚力量的独联体和欧亚经济联盟举步维艰。如果安全和扩展利益都不是形成联盟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它们对非联盟国家又意味着什么？作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中俄均受到来自美国的共同威胁，在国际秩序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共同利益的情况下，非联盟能否发挥准联盟的作用？这些都成为值得进一步考察的问题。

国际合作理论深受传统文化理念、外交实践和世界形势重大变化的影响。^[3]一般认为，合作是有条件的。米尔斯海默对国际合作表示悲观，他认为大国争夺权力是常态，但“均势逻辑常常促使大国结成联盟，联合反对共同的敌人”。^[4]即便如此，国际合作只在环境和经济等“低级政治”领域可能存在，而在安全等

[1] Glen H. S.,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t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4(1):104,1990.

[2] Patricia A. W., *Dangerous Alliances: Proponents of Peace, Weapons of War*,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3] 孙吉胜：“‘一带一路’与国际合作理论创新：文化、理念与实践”，《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3期。

[4]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高级政治”领域前景将变得枯竭。^[1]基欧汉则认为，经济事务和安全事务之间没有一道显而易见的分界线，制度理论也适用于安全事务，因为制度可以提供有效的信息，从而创建一个良好的合作环境。^[2]安德鲁·基德认为，国家间对话可以将囚徒困境转化为保证性博弈，进而开启合作。^[3]肖晞、宋国新认为，共同利益和身份认同是影响国际合作的两个核心变量，二者的共振决定国际合作的实现程度。^[4]郭树勇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推动外交模式由自助向扶助转变，二者的区别是：自助建立在国家实力基础上，以追求相对收益为最终目标；而扶助建立在国际伦理与共同体整体利益基础上，以追求共同命运和整体利益为最终目标。^[5]笔者认为，均势、制度和对话是国际合作的必要条件，但是并不充分。即便将三者叠加，即处于均势中的大国通过对话建立了基本的互信并在国际组织中用制度的形式加以保障，仍未能确保其合作是持久的和有效的。欧洲是均势理论的发源地，欧盟是靠谈判和制度约束整合起来的共同体，但是仍不能避免已入盟47年的英国同欧盟分手，回归“光荣的孤立”角色，就是对此观点的证明。扶助外交强调国际伦理和整体利益，然则单向度的扶助往往带来的却是被扶助方的不领情。扶助方不仅得不到相应的回报，甚至其“道德出发点”也被攻击和质疑。近年来，中国对中亚五国的国际援助很多，却不能消除“中国威胁论”和“资源掠夺论”，这说明“道德语言”替代“经济语言”的适用性尚有待论证。将“共同利益”和“身份认同”作为两个变量，从软性的心理和硬性的利益两方面结合起来考察国际合作的概率，是一个很好的视角。这两个变量的值越大，国际合作的可能性越大，而非联盟国家这两个变量的值明显低于联盟国家，那么关于非联盟国家的国际合作是否可能，也就是导向合作的两个变量的值域在哪里，无法得出结论。鉴于合作必然是友好国家而非敌对国家间的关系，如果在联盟国家和非联盟国家之间引入“共同体”这个概念，那么又是什么样的条件使非联盟国家对共同体的认知超越虚幻而成为现实？

[1] John J. M.,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3):16, Winter 1994/95.

[2] Robert O. K. and Lisa L. M., “The Promise of Institutional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43, Summer 1995.

[3] Andrew K., *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4] 肖晞、宋国新：“共同利益、身份认同与国际合作：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社会科学研究》，2020年第4期。

[5] 郭树勇：“大危机下的国际合作与外交转向：国际政治社会学的视角”，《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3期。

非联盟国家的合作既是理论问题，也是现实问题。安全对结盟与合作至关重要，但安全对不结盟国家的合作意味着什么？收益也是结盟与合作的重要考量，但非联盟状态下能否确保合作收益的稳定性？身份认同虽不是结盟的充分条件，却是合作的必要条件，它是否制约着非联盟国家合作？下面就以中俄在“十四五”期间到2035年的安全环境、收益路径和身份认同为例，探讨哪些因素是非联盟国家深度合作的基础。

安全因素对中俄合作的影响

安全问题曾是中俄合作的最大障碍。中俄两国拥有漫长的陆路边界，直到21世纪东西两段国界线议定才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消除两国边界隐患奠定了法律基础。2001年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两国“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理念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为双方睦邻友好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从1992年“相互视为友好国家”、1994年“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到2011年“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再到2019年“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的互信程度不断增强。“十四五”期间到2035年中俄安全关系如何发展，直接影响两国合作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以下简称“带盟”）对接。

世界动荡对中俄两国安全局势形成挑战。苏联解体对国际格局的影响是深远的。相比冷战时期二元对立的世界体系，目前国际上多种力量并存，但多极格局尚未形成。美国刚从“历史终结”的喜悦中醒来，就发现没有对手的战略将无处安放，更糟糕的是中国等新兴国家奋起直追，相形之下美国出现了衰落的势头。在“美国优先”和“让美国再次强大”的口号下，自私自利、唯我独尊成为美国的行为准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社会建立的各种规则被破坏殆尽。随着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经济上的结构问题难以扭转，民粹主义在美国兴起，其特点是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并惯性寻求外部原因。2017年12月18日，美国公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1]，称中俄为全球秩序的修正主义者，并将两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对中国展开了贸易战和科技战，并从地区安全和国际舆论各战

[1]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2021-05-26].

场对中国封堵，以遏制中国崛起的进程。同时，美国对俄罗斯延续制裁措施，与之在军事和外交等领域展开斗争。2021年1月20日拜登宣誓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后，对特朗普的国内政策有所调整，但外交政策不仅没有放松，反而变本加厉，通过组建国际民主联盟、支持中国台湾和搅乱乌克兰局势等手段同时对中俄施压。对于美国的盟友，拜登政府既要原有秩序和规则进行调整，又不得不顾及各方利益的交叉和冲突，国际协调的成本和难度大大增加。2020年下半年以来，欧美迎来了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疫情使经济下挫，贫富差距加大，社会出现不稳定因素。概言之，“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1]面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围追堵截，中俄势必联手做出某些反应。

中国的任务是促危转机。动荡变革中总是危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两个大局”，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是“十四五”规划出台的时代背景，也是探讨中俄合作的历史背景。从国际来看，中国的快速发展使世界任何国家都无法忽视。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幅提高，但兼具东方大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双重身份，使西方社会产生疑虑和恐惧。近年来中美博弈加剧，不仅对合作共赢的传统关系造成威胁，也对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的效能产生影响。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黑天鹅”和“灰犀牛”频出，对“一带一路”和其他外向型制度设计构成挑战。《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正式签署，标志着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式达成，地区经济一体化迎来重要里程碑，但能否拨正逆全球化浪潮还有未定之数。从国内来看，中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万美元，城镇化率超过60%，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创新能力不足，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因此，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是“十四五”规划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能够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独特优势，这次抗疫斗争有力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优越性。”^[2]后疫情时期，如何充分发挥中国制度优势，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1]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社，2020年8月24日。

[2] 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求是网，http://www.qstheory.cn/qshyjx/2020-09/08/c_1126468086.htm[2021-01-29]。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重要任务。深化非联盟国家间务实合作，正是以国际大循环带动国内大循环的重要举措。

俄罗斯欲借“东向”战略摆脱危机。1991年底苏联解体。尽管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地位，却难以恢复其在世界舞台上的昔日荣光。东欧剧变、俄格冲突、乌克兰危机、白俄罗斯大选、摩尔多瓦要求俄军撤离等发生在原苏东地区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俄罗斯在传统势力范围的控制力有所下降。从主宰世界的两极之一变成难以主宰欧亚地区，俄罗斯的大国情怀无处安放。在北约的挤压下，俄罗斯不得不采取了一些反制措施，如通过公投将克里米亚纳入俄联邦、清除外国非政府组织的影响等，但却因此遭到西方世界的联合制裁。除了投资转移和人员限制之外，欧洲议会一再抹黑苏联和斯大林，并以此影射俄罗斯和普京，号召欧洲人民加强团结以增强对“当前至关重要的外部威胁”的抵御能力。^[1]随着疫情给各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逐渐加深，以及一些大国领导人的更替，在可预见的将来，德国政府可能采取政治不认同但不影响经济合作的态度，俄德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缓和；法国对俄罗斯政策的独立性和开放性日渐清晰，俄法可能回归“特殊伙伴关系”；俄英关系虽然在间谍门事件后一度紧张，但暂时不会有新的变化；至于俄美关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衰退，而且没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得到改善。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采取了“东向”战略，与中国和东盟的合作日益巩固。2021年，俄罗斯经济在米舒斯京总理治下有望企稳，但原有的人口结构、营商环境、能源依赖、闭合循环等问题都没有得以解决，加之制裁和疫情限制了经济发展，2021—2025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率将低于世界平均预期（见图1）。俄罗斯向外突围的策略和手段有限，不仅限制其成为超级大国，也限制其区域发展。俄罗斯对地区一体化的重视程度远高于全球化，但从欧亚经济联盟的运行来看，2015年以来其内部贸易转移效应并不明显，五个成员国相互投资总额年均约为10亿美元，对内依存度远低于外部依赖。因此，对俄罗斯来说，发展与非联盟国家的合作势在必行。俄罗斯著名政治学者卡拉加诺夫认为，俄罗斯应成为“新不结盟”的捍卫者，这可能是俄罗斯面对日益激烈的中美博弈提出的“万全之策”。^[2]

[1] “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of 19 September 2019 on the Importance of European Remembrance for the Future of Europe (2019/2819(RSP))”,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doceo/document/TA-9-2019-0021_EN.html [2020-01-01].

[2] С. Караганов. Россия в мире после коронавируса: новые идеи дл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http://www.karaganov.ru/publications/546> [2020-04-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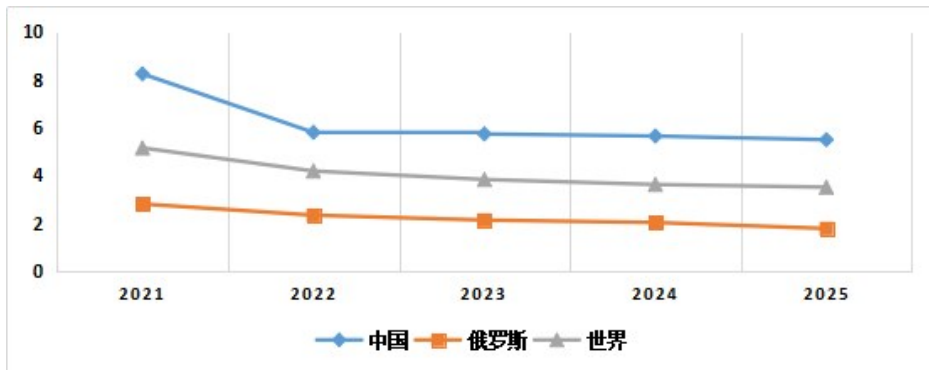


图1 “十四五”期间中国、俄罗斯和世界的经济增长率预期 (%)

数据来源：IMF。

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不等边变化，拉近了中俄在安全领域的距离。“十四五”规划强调，“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1]，特别是实现重要产业、基础设施、战略资源、重大科技等关键领域安全可控，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这是对大变局之下可能蕴含的风险和变动的积极防御。虽然中俄在“十四五”期间面临的国际环境和要解决的国内问题不尽相同，但两国都意识到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在传统安全方面，近期中俄在陆上和海上举行的联合军演说明两国政治互信和军事合作已达高水平。新形势下，中俄成立了两个联合委员会，其一为边界联合委员会，其二为跨界水联合委员会，将在跨境基础设施建设、跨界水体监管和打击跨境犯罪等方面加强协作，黑瞎子岛地区周围水域航行和中国船只经图们江出海航行等事宜有望得到解决。在非传统安全方面，两国还应进一步落实2020年12月2日签署的《中俄总理第二十五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纪要》以及《中俄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发展规划（2018—2024年）》（修订版）。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形态，代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未来方向，其中数据安全尤为重要。俄方支持中方提出的《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双方将在国际上就保护知识产权问题协调立场。目前来看疫情是影响世界经济和民生状况的最大不确定因素。“十四五”期间双方将继续推动抗疫领域合作，加强制药和医疗产业合作，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

为农产品和海产品进出口制定特殊时期的卫生检疫规则，联手反对将疫情政治化。中俄将于2021年举行传染病暴发应急联合演习。

扩展利益对中俄合作的影响

中俄都属于建立了市场经济但国有企业仍在关键行业占相当比重的国家，政府在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鉴于以往中俄双边民间贸易和投资增长缓慢，“十四五”期间中俄深化合作有两个思路：一是政府主导，二是全面开花。2020年9月26日，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部颁布了《俄罗斯联邦2021年社会经济发展预测和2022—2023年计划》（以下简称“俄联邦三年计划”）。该计划预测2021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3%，2022—2023年将以不少于3%的速度增长（见表1，保守预测在基础预测的版本上各项指标均有下调）。“俄联邦三年计划”对传统行业、新兴行业和优势行业做了分析和预测，也对俄联邦各行政主体的财务状况进行了评估，注重数据分析，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苏联时期计划经济的特征。中国“十四五”规划与“俄联邦三年计划”虽风格不同，各有侧重，但在对世界经济形势和本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的研判上有共同之处，这说明双方有达成共识的认知基础。两国有必要在各自发展规划的基础上，确立合作领域和项目，注重顶层设计并落实对接。

表1 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速基础预测（%）

指标构成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国内生产总值	1.3	-3.9	3.3	3.4	3.0
采矿业	2.0	-8.4	1.2	4.7	0.7
基础产业（采矿业除外）	1.2	-5.3	4.1	3.6	3.6
其他经济活动	1.8	-2.4	4.1	3.8	3.7

数据来源：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огноз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2021 год и на плановый период 2022 и 2023 годов, с. 24。

（一）投资领域

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369.1亿美元，蝉联世界第二位。2019年，

中国对俄直接投资流量为-4.2亿美元，但存量为128亿美元，占中国对所有转型经济体投资存量的44.4%。造成直接投资流量为负数的原因，主要是采矿业大幅撤资。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09—2019年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为农林牧渔业，总计超过31亿美元；其次为采矿业，总额约23亿美元；接下来依次为制造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科研技术和地质勘探业、建筑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和其他行业，总计分别约为16亿美元、12亿美元、6亿美元、4亿美元、3.5亿美元、3亿美元、2.5亿美元、0.33亿美元和0.26亿美元；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为-426万美元，主要是2016年出现了一笔较大撤资的结果。这样的投资结构与中国在全球的投资结构是有差异的。从中国在全球的直接投资行业类别来看，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居于前三位，而它们在中国对俄投资中均跌出前三。位居近年来中国对俄投资总额第一和第二位的农林牧渔业和制造业年投资流量并不高，但保持了稳定发展，与俄罗斯政府对这两个行业采取扶持政策，包括租赁农业设备和贷款优惠等有关；而中国对俄采矿业投资大起大落，出现最高和最低两个峰值，分别为2015年投资14亿美元和2019年撤资11亿美元，是受俄罗斯国内投资政策和投资环境影响的综合结果。2015年，中俄签订《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推高中国对俄投资，但因各种原因，此后直接投资逐渐走低。撤资行业数量最多的年份是2018年，而撤资金额最多的年份是2019年，这是俄罗斯经济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显示中国投资者对俄罗斯市场信心不足。政策多变、汇率不稳、配套不完善、腐败盛行历来是阻碍俄罗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也势必投射到在俄中资企业，动摇它们的投资信心。

“十四五”期间，两国应充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的作用，推动具有可行性的投资项目落地。据“俄联邦三年计划”预测，到2023年，俄罗斯工业生产将比2019年增长4.3%，其中制造业将增长8.1%。工程行业将获得较高增长率，如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的生产将增加20.8%，电气设备生产将增加5.8%，其他机械设备生产将增加7.9%。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信息技术、建筑和运输，以及房地产和专业化服务将成为俄罗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特别是出口导向型行业（化学品、食品加工和木材加工等）将成为增长的领头羊。信息通信和教育产业将快速发展。上述增长性较强的行业应成为中国投资者的关注重点。此外，两国应拓展在高新技术、基础设施和数字经济等领域的投资合作，推动中国投资向更多领域和产业链的更多环节拓展。在金融领域，应在双边贸易、

投资和借贷等经贸往来中扩大本币计价结算，鼓励符合条件的发行主体在两国金融市场发行债券，推进支付系统和银行卡互认合作等。

（二）贸易领域

中国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但中俄贸易发展缓慢。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以中俄和中越进出口额为例，1995年中俄贸易额是中越贸易额的5倍，直到2015年中越首次以960亿美元的贸易额超过中俄的681亿美元，此后中越贸易额节节攀升，而中俄贸易额增长缓慢。截至2020年底，中越贸易额为1923亿美元，几乎是中俄贸易额的2倍。中韩贸易额始终高于中俄贸易额，2018年几乎是中俄贸易额的3倍，至今还在强势增长（见图2）。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与韩国和越南都在全球产业链中，形成了上下游分工合作的关系。借助中国的强劲发展势头，韩国和越南对华进出口均快速增长。而俄罗斯与中国没有形成密切的产业链，只在能源和农业等领域形成了供应链，产业合作不深入，使俄罗斯难以借力中国快速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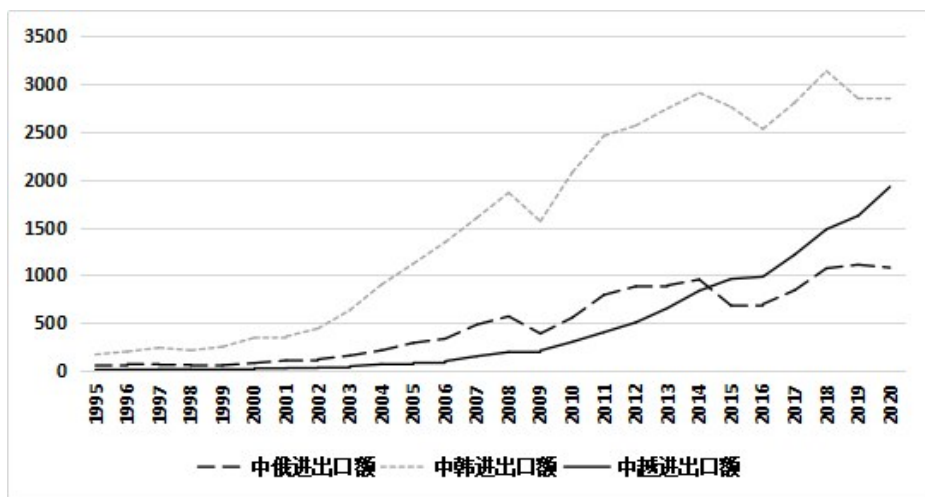


图2 1995—2020年中俄、中韩和中越进出口额（亿美元）

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

未来几年的中俄贸易中，能源和军备仍是抓手。2021年俄罗斯石油产量（包括天然气凝析）将达到5.18亿吨，2022年将增加至5.52亿吨，2023年为5.60亿吨。石油生产的主要地区仍然是西西伯利亚和乌拉尔—伏尔加地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将继续开发普里拉兹洛姆尼、诺沃港和梅索亚哈油田，卢克公司将继续开发北里海和波罗的海大陆架的矿床，俄罗斯石油公司计划开发埃尔金集

群和北科姆索莫尔以及北达尼洛夫斯基油田。预计到2023年，俄对外国的石油出口将增长到2.42亿吨，主要是对亚太国家的供应增加。2021年乌拉尔石油价格预计为每桶45.3美元，2022—2023年在46~48美元/桶之间。从中期来看，俄天然气产量将继续呈上升趋势。2023年天然气产量预计达到7956亿立方米。天然气生产的战略区域是亚马尔半岛、东西伯利亚、远东以及俄罗斯大陆架。2023年，天然气出口量将达到2405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出口量将增长至3780万吨。能源方面，除化石能源，核能源合作将是一个新的增长点。随着经济结构的缓慢调整，非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将主导商品出口结构（2021—2023年所占份额超过50%，而2019年为43%），进口将温和增长（商品进口2022—2023年预计增长4.3~4.7%，2021年同比增长5.1%）。飞机制造综合体发展的主要因素将是在国防和军事技术合作的框架内交付飞机设备，而这将有助于发展民航设备，包括MS-21、SSJ-100、米-8/17/171、安萨特、Ka-62和轻型多用途直升机。“十四五”期间中俄两国计划签署《至2024年中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特别提到大豆合作，包括大豆贸易和投资等全产业链合作有望深化，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近年来，速卖通等电商平台在俄成长迅速，两国又签订了《关于电子商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旨在电子商务立法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等方面加强合作，这符合两国加快电子商务乃至数字经济发展的共同需求。

（三）科技领域

“十四五”时期是中国国内经济面临结构调整，而国外又存在“脱钩”风险的关键期。中国一方面立足自身进行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也希望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推动国内经济转型和科技进步。从中美研发对比来看，中国与美国研发差距最大的是制药业、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强度差高达4367.9%；其次是医疗保健设备与服务，强度差为254.1%；差距较大的还有技术硬件与设备、汽车与汽车零部件、软件与服务等（见表2）。俄罗斯是传统科技大国，核工业和航空航天业尤为发达。近年来，俄罗斯大力发展生命科学和制药等相关行业，在软件与服务领域也取得了较大进展，对接有助于中国补齐短板。然而，苏联解体后，产业链断裂和人才流失等因素导致俄罗斯在制造业上整体优势不再，除能源、化工和军备制造等优势行业外，其他行业均存在升级换代的问题。

表2 中美行业研发强度对比

行业	美国	中国	中美差距
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	4812.0%	444.0%	4367.9%
医疗保健设备与服务	260.7%	6.6%	254.1%
技术硬件与设备	91.7%	7.9%	83.8%
汽车与汽车零部件	76.9%	6.9%	70.0%
软件与服务	52.6%	12.3%	40.2%
食品、饮料与烟草	21.1%	1.7%	19.4%
半导体与半导体生产设备	34.2%	14.8%	19.4%
资本货物	13.4%	5.4%	8.1%
食品与主要用品零售	7.5%	0.3%	7.2%
材料	7.1%	3.4%	3.7%
零售业	3.9%	1.1%	2.8%
房地产	1.9%	0.7%	1.2%
保险	1.4%	0.4%	1.0%
银行	0.0%	0.0%	0.0%
运输	0.5%	1.0%	-0.5%
电信服务	5.7%	6.3%	-0.6%
公用事业	0.2%	1.0%	-0.8%
能源	1.2%	2.3%	-1.1%
耐用消费品与服装	2.2%	3.3%	-1.1%
商业和专业服务	3.3%	4.5%	-1.2%
家庭和个人用品	1.0%	2.6%	-1.5%
多元金融	1.3%	3.1%	-1.8%
媒体	0.8%	3.0%	-2.2%
消费者服务	2.2%	4.7%	-2.5%

数据来源：平安证券研究所策略配置与前瞻性研究团队（魏伟、陈骁、张亚婕、郝思婧、谭诗吟）：“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十四五’产业发展聚焦战略新兴、现代服务、基建

和数字经济”，Wind专题数据库，2020年11月4日。

2020—2021年是中俄科技创新年。目前，两国在航天、通讯和基础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合作进展顺利。“十四五”期间，两国将以落实《2018—2022年中俄航天合作大纲》为基础，拓展两国在月球和深空探测、国际月球科研站、运载火箭及发动机、对地观测、低轨卫星通信技术应用、航天电子元器件、空间碎片检测等领域的长期互利合作。在卫星导航领域，提升北斗和格洛纳斯系统兼容共用服务性能，在对方境内互设监测站。深化在重离子超导同步加速器（NICA）装置框架下的合作研究，完善联合科研项目的竞赛机制。发挥中俄联合科技创新基金的作用，推动科技成果孵化。“十四五”期间，两国将进一步深化信息通信技术和数字发展领域的合作，扩大无线电频率资源管理领域合作，加强两国在网络安全领域的互信。在终端操作系统（包括极光移动操作系统）方面，深化两国移动设备、半导体生产商和软件厂商之间的联系。探讨在物联网、人工智能、数字教育、5G网络、“智慧城市”、网络安全等具有广阔前景的领域深入合作，加强先进管理体系和技术实践方面的交流。

（四）交通、海关等其他领域

交通运输方面，应尽快完成国际运输通道建设，就过境运输便利化和无人驾驶通道的可行性进行研究。海关方面，实施“绿色通道”“经认证的经营者互认”“海关监督结果互认”等，就商品原产地信息电子认证系统的运行进行协作。此外，俄罗斯在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方面技术领先，产学研结合和互联网+将为实体经济带来新的增长点。

总的来说，中国“十四五”规划涉及的方面很多，包括科技创新、实体经济、双循环、健康平安等诸多亮点，不仅会带动中国国内相关领域的投资热、项目热和研发热，也必将为中俄合作开辟新空间。2021年12月之前俄罗斯将出台一项全国行动计划，以恢复就业和收入、经济增长以及长期结构变化（进一步扩展为“国家计划”），包括启动新的投资周期和改善商业环境，在数字化、放松经济管制、增加出口和支持进口替代的基础上加速技术发展和提高生产力。未来，俄罗斯有赖在信息通讯、纳米、生命科学、尖端武器等领域的科技创新取得实质性进展，但自身投资不足和创新能力不足是制约其发展的瓶颈，这为中俄合

作提供了发展空间。^[1]

中俄两国都认为疫情流行将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当务之急是防范风险，对本国发展规划做出相应调整，同时两国都将数字经济作为未来发展方向，大力扶持关联行业，尤其是信息技术产业，这说明双方有达成共识的认知基础。然而，与中国在五年规划中明确提出“双循环”不同，俄罗斯的三年规划较少提及国际因素，这反映出俄罗斯经济短期内还摆脱不了闭合循环的状态。此外，中国明确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俄罗斯的外交优先方向仍是欧亚经济联盟和独联体国家，反映出两国对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倚重不同。时至今日，中国已与多国签定自由贸易区协议，但迟迟不能达成与欧亚经济联盟的自贸协定和最惠国待遇，这也提示需考虑非联盟国家对扩展利益有着不同的诉求，在推进合作时不可操之过急。

身份认同对中俄合作的影响

“当前，中俄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双方坚定支持对方维护本国核心利益，政治和战略互信坚实牢固；积极推进各领域合作，两国关系内生动力不断显现，利益交融日益深化；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和 international 公平正义发挥了重要建设性作用”。^[2]2020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联邦总统普京多次通电话，就抗击疫情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等国际大事交流协调，反对将疫情政治化，反对西方歪曲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事实的行径，中俄在广泛国际问题上的一致立场为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国际舞台上，中俄都反对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主张通过政治协商解决冲突，强调保护人权的活动应以公平和相互尊重的对话为前提，认为联合国的议题应有助于各国的团结，而不是产生新的分歧。中俄都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捍卫者，认为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协调者应发挥关键作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应综合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中俄都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主张在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区域性或全球性的国际组织框架下加强合

[1] Прогноз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2021 год и на плановый период 2022 и 2023 годов |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economy.gov.ru)[2020-12-06].

[2] 习近平：“在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时的谈话”，《人民日报》，2019年6月6日。

作，提升贸易和投资规模。目前，“一带一路”倡议与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对接取得实质性成果。2020年10月28日《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联委会首次会议成功召开，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以往议而不决的系列难题有望解决。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中俄合作处于史上最好时期，但不意味着不存在任何问题。一些俄罗斯精英对中美对抗持观望态度，在出售先进武器给亚太国家时有远近之分，坚持与越南联合在南海采油，对中国投资有不切实际的想法等。诸如此类的表现，说明西化派在俄罗斯树大根深，对“东向”战略只是表面支持，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带盟”对接取得更大成果。^[1]从身份认同的角度而言，中俄作为非联盟国家加强合作，可能并非为了对抗一个强大的对手，而是为了增加战略自主性和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

总 结

不结盟运动是在冷战中发展起来的，独立、自主和非集团是其宗旨。中国是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国。如今，冷战已宣告结束，新兴国家蓬勃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明显变化，但中国仍是不结盟外交的坚定奉行者。按照米尔斯海默的观点，大国没有形成联盟，也可能是因为组建联盟的成本较高，且综合实力相当的情况下难以解决领导权问题。^[2]而杰克·列维（Jack S. Levy）和威廉·汤普森（William R. Thompson）认为，陆权国家更容易与海洋强国结成联盟，而非与另外的陆权国家结成联盟。^[3]与其用这些理论来解释中俄不结盟的原因，不如解释为：中俄同为举足轻重的大国，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历史上有过结盟时期，因此对结盟有了自己的看法。简单来说，就是没有共同利益，结盟也靠不住；有了共同利益，不结盟也可以深度合作。因此，新时期中国对大国外交的基本理念是：“国家之间要构建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大国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管控矛盾分歧，努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

[1] 关于身份认知和价值认同，本人写过几篇文章，此处不再赘述。参见欧阳向英：“俄罗斯外交哲学论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8期；欧阳向英、房晓辉：“自我认知与发展战略——中俄‘带盟’对接的现状与阻碍对接的原因分析”，《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3期；贾中正、欧阳向英：“解析俄罗斯的国际议题设置”，《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9年第5期。

[2]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3] Jack S. L. and William R. T., “Balancing on Land and at Sea: Do States Ally against the Leading Global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5(1): 18, Summer 2010.

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1]“结伴不结盟”是新时期中国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的应对之策。

作为近年来在美国国际政治领域较有影响的一个流派，新现实主义的观点之一是大国经济合作容易推进，而安全合作将困难重重。然而，中俄合作的实践表明，新现实主义理论具有局限性。尽管中俄两国在经济合作的某些领域还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多为发展中的问题，可以在发展过程中予以解决，并不影响两国在国际安全领域紧密合作。首先，两国领导人率先垂范，推动坦诚、紧密的“元首外交”，为推动安全领域务实合作打开大门。其次，《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协定》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防部合作协定》等一系列文件为两国安全合作提供了法律保障。最后，不断增强的对话沟通和文化认同为两国安全合作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事实胜于雄辩，但新现实主义对大国缺乏互信的分析仍是有价值的。其实，互信是在从政府到民间一轮轮交往中信任传导的叠加，其间每一次传导不信任的行为都将影响下一轮对方的行为并反作用于己方行为本身。也就是说，“强关系”传递的是同质信息，“弱关系”才传递更新信息。这也提示我们，非联盟国家合作应更加重视消除“不和谐”信号，因为正是这些信号的叠加和传导最终导致大国间失去信任。为提升非联盟国家间合作的质量和水平，提出如下呼吁。

非联盟国家合作，要相互尊重。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俄合作领域十分广泛，但仍存在一些问题，这符合非联盟国家合作的特点。合作需要前提，而两个非联盟的大国之间进行合作最重要的前提就是相互尊重。中俄相互尊重领土和主权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以改变对方制度和现状为目标，这是互利合作的基础。

非联盟国家合作，要相互体谅。中俄既在高层有固定对话机制，又在学术界、企业界和民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使彼此的信号传递不会失真，出现错误信号又能及时纠偏，这是中俄战略协作的保障。非联盟国家要想开展深入合作，类似中俄这样的沟通和交往机制必不可少。真实而坦诚的交往是消除误解的基础，但有时中断合作不是误解造成的，而是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如果确有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双方也应相互体谅，而不是强人所难。

[1]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谈“一带一路”》，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

非联盟国家合作，要符合现实需求。中俄曾在政治体制上相互借鉴，又在经济上相互补充，这使得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内生性。近年来，美国对中俄同时施压，客观上拉近了中俄两国的距离，也使得两国关系具有了外部性。在内生性和外部性的共同作用下，中俄各领域务实合作必将达到新的更高水平。这是两国的现实需求，也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从目前来看，尽管中俄建设经济共同体尚存阻碍，但两国在抗击疫情中给予医学互助和国际道义上的相互支持，有助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中俄对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认知，也使两国建设命运共同体具备了一定基础。

非联盟国家合作，要有明确的抓手。中国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的国策，给俄罗斯进入中国市场带来机遇，俄罗斯的能源、原材料和农产品有望扩大在华市场份额。鉴于数字经济在未来经济形态中的核心地位，以及中俄两国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5G通信等方面的研究与应用已有良好开端，两国应以数字经济催生的新业态为抓手，扩大合作与对接。

非联盟国家深入合作有很多前提，但最主要的还是相互尊重。迄今为止，美国是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物质财富最多和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中国无意与美国对抗，但中美却无法深入合作，其根本原因就是美国极力阻挠中国崛起，并以改变中国的根本制度为目标，说明美国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缺乏了解，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缺乏尊重。反观新兴国家群体，绝大多数遵循独立自主、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国际关系准则，为非联盟国家合作打开大门。“德不孤，必有邻”，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联盟国家必将冲破重重阻碍，将全方位务实合作推向前进，从而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责任编辑：崔秀梅）